

【历史文化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赋权下的妇女话语

胡 静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01)

摘 要: 女性话语是革命与现代化同构中并行的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女性话语在革命场域中拓展了空间,以竞赛活动的实践方式揭开了被性别属性覆盖的政治权利。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使得女性话语逐渐并入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发展的语境中。女性话语在时代律动中书写着历史叙事,为现代化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 政治赋权; 竞赛活动; 女性话语;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K82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77X(2021)01-0066-06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空间中,女性在政治场域中的站位反映了其阶级、群体在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双重维度中的生成。女性话语在伦理关系、权力分配、文化镜像等系统中占有的生存空间,表达了这一空间的客观性、匀质性和科学性。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女性话语的政治场域

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就参悟到:人是动物,但在本质上区别于动物,人有更高的政治生活追求,即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是国家的属性,也是执政党的属性;因而国家和执政党是政治的产物,群众是政治的受动者。女性话语作为意义,在政治场域中彰显了女性的阶级性;女性话语作为行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妇女的权利和价值,实现了妇女认同的内敛性到外显性的转变。

(一) 妇女政治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探源

关于女性政治话语,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分析了女性不适合政治生活的原因,他认为女人像植物,安静而舒展,她们活在表象的氛围之中,信赖主观直觉,在逻辑上家庭就是她们唯一能把握的具体统一性,这是由自然生命的差异所决定的。^[1] 马克思批判性地分析了黑格尔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

中强调男女平权的思想。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剖析人的关系奠定了理论根基。马克思提出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力,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人的关系的前提。进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清晰地表述了物质生产是个体集合起来参与政治活动的前提。人作为物质生产的主体呈现了人的社会关系,而人的社会关系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先决条件。人的社会存在蕴含了人自身“固有的力量”,上升为“类”存在的状态便意味着协作,并且与人的物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物质生产的“类存在”,只有超越了“公民”这一抽象的政治形式,才能组织起真正的政治力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从“两种生产”的演化阐述政治力量的形成及变迁。一方面以劳动的发展阶段为基础,立足于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劳动分工的演变;另一方面以家庭形式的发展为动力,分析男女关系的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人类历史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演进历程,体现了政治力量的驱动。家庭内部的发展趋同于人类文明的赓续,譬如妇女从事家务和抚养的劳动与男子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相比对家庭的贡献越来越不被

收稿日期: 2020-09-12

作者简介: 胡 静(1991—),女,山东菏泽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重视,男子的物质生产劳动即社会劳动成为关系家族兴衰的重要因素,而妇女的家务劳动即私人劳动则成了无关紧要的附属品。^[2]这种男女两性天然生理差异所决定的分工导致了历史性的后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导致人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关系中被迫接受经济压迫,劳动力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和对象,形成了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诠释了人的关系中男女政治不平等的原因。由生产关系造成的极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从而转嫁到政治压迫中,扭曲了人作为劳动者的自我认同与政治认同,女性群体是其境遇下的显著代表。因而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获取政治权利的先决条件,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中的地位。特定社会关系中,女性角色的转变也是时代变迁的写照。马克思提倡的男女平权的政治思想,在近代化的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平等、分配在劳动中的认知,为女性话语在“阶级”与“性别”的交叉范畴中提供了革命空间。

(二) 新文化运动前后女性政治话语的空间扩展

辛亥革命以来,随着“国民”概念的消亡,取而代之的“阶级”出现,以对财富的占有作为划分界限,界定了身份认同的标准,也为“劳动”向正当性、公平性的发展创造了空间,随之拓展了女性话语的语域。发端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天赋人权”的叙事层面一直把女性权力置之度外,女性在国家、政治中处于缺位状态。在家庭史的层面,古希腊女性被赋予的“女公民”仅作为合法公民母亲的一个标签,发挥的只是担保小公民正当性的功能意义,不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含义。在向现代国家的过渡中,西方世界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女性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向度中弥补了女性话语的政治内涵。新文化运动借鉴、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内容,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女性话语的演进,深化了对女性话语的政治认知。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精神以“革命性”为表现形式,时时都在证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只有科学精神是最“革命”的。^[3]这种“革命性”在女性话语的建构中得到了充分诠释。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促动,强烈激发了女性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崇尚与追求。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主权的诉求与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政治的本质,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妇女在德性政治的背景下发挥着维系亲缘纽带、弘扬社会道德的恒定作

用,反映了女性话语的道德力量,并逐步政治化。在微观层面,女性话语表现出对传统父权制的反思与摒弃。康有为曾将传统女人的处境概括为“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具”,深刻反映了父权体制下的女性形象。父权体制局限女性之余,也令男人承受了极不人性的压力与要求,使男性的形象与心态也相当扭曲,自幼被要求在事业、性事及一切事情上坚强勇猛,要非人性地压抑、掩饰一切人性的脆弱。男性关怀女性主义,其实也是自我解脱之道。^[4]男权文化的出现和持续并非是历史合理的、最好的选择。这种文化也是需要修改并且完全能修改,只要条件成熟了,有人去积极地推动就可以创造和改变。^[5]随着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的传播和价值理念的进步,以男性为主流的群体试图突破父权制的束缚,积极倡导女性自由、解放,为女性话语开拓了崭新路径。

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冲击,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学术著作也被国人所追捧和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翻译和学习俄国妇女解放的相关专著,延展了女性话语的政治空间。李大钊最早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赞颂了苏俄倡导妇女与男性联合工作的思想,为妇女解放提供了路径选择。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国日报》刊文中,详尽记述了苏俄妇女的教育平等、婚姻自由等政治权利。《劳农俄罗斯之妇女》《俄国与女子》《俄罗斯之女劳动家》等文章的陆续发表,极大地触动了国人:“把数千年来呻吟于残酷桎梏之中的妇女完全解放,使他们从今而后,可以享受人类所应享的权利,可以恢复其固有的人格,可以养成一个健全的公民”^[6],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研究与普及。赵叔愚翻译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翻译了更多涉及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著作。如李汉俊翻译了德国倍倍尔所著的《社会主义与妇女》部分内容,名为《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震赢翻译的《俄国与女子》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俄罗斯研究专栏;李达翻译的《劳农俄罗斯中劳动底研究》部分章节,名为《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东方杂志》发表的恽代英翻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7]这些文章深刻剖析了妇女的政治地位和受压迫状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和动员提供了思想依托和行动指南。此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

章程》中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国际书记的任命,并组织共产国际妇女支部”^[8],以条文的形式为妇女运动提供了组织力量,凝聚了妇女群体的思想共识。号召各国共产党吸收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直接提振了妇女的革命作用和政治地位,间接赋予了女性政治权利和政治话语。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对上海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新青年》上刊登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和章程。改组后的上海女界联合会成为引导妇女工作的进步团体,推动了全国妇女运动的开展,深化了妇女群众的政党意识,也鼓舞了妇女群体的革命斗志。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对中国妇女运动作专题报告,论述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阐释了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使中国的女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男女工人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9],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必由路径。妇女作为最基础、最广泛的革命形象表征,唤醒并激发了妇女的政治认同,界定了妇女的革命地位,规范并具化了女性话语的内涵。

革命时期的女性话语问题不是一个孤立、局部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生理意义上性别话语的争取,而是贯穿于经济、政治、伦理、制度等层面的社会问题。陈独秀曾明确强调“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10]妇女的话语空间融合在社会思想、社会制度中与妇女的政治赋权、自由解放相辅相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解构传统的女性话语模式,重建妇女作为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和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对妇女“人力效用”最大化的引导推动了妇女解放在经济与政治双重意蕴中的实现。女性主体立场构成的整体与革命历史紧密结合,妇女的集体身份和群体活动被镶嵌到多重社会关系中。妇女群体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蕴藏的巨大潜能,预示了妇女在集体认同中即将颠覆政治秩序和权威操纵。

二、妇女竞赛活动形塑了革命空间中的话语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也表明了妇女极易被外力所改变的特质,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外交困的时局,为妇女提供了被改造的革命空间,妇女以竞赛活动的实践方式被动员和组织,在革命时期发挥了关键的群体效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竞赛活动是在劳动中展开的,劳动意味着平等,在政治上表现为自由。性别问题也在劳动中得以考察,在劳动实践中唤起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妇女的革命积极性,建构了女性的群体话语。在劳动中实现政治认同,在认同中重塑性别权利,男女平等成为女性对自身性别属性的形塑。

(一) 妇女竞赛活动的内容考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物质匮乏是贯穿于整个革命时期的现实,中国共产党采取生产竞赛等自救方式应对不同阶段的经济危机。自然因素导致的灾荒和地域性灾害,内外战争、军阀割据、国民党对边区的骚扰、掠夺、经济封锁等社会因素,引发了严重的人口流动、难民迁徙,加剧了粮食短缺的严峻性、紧迫性,一系列成因促使生产竞赛的开展。妇女以高涨的热情在“革命竞赛”中展现出新型劳动力形象,也试图通过劳动实现性别平等的政治夙愿,建构革命的女性话语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妇女作为独特的劳动群体依旧活跃在公私合营、农村合作社、大跃进等重大竞赛活动的历史现场,塑造着新时期女性形象,书写着伟大的女性奇迹。妇女积极响应党的方针和根据地政策,主动参与各阶段的生产运动,包括春耕秋耕运动、秋收防疫运动、修堤运动、纺织运动等;妇女还以生产突击队、冲锋劳动队、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肥料合作社、妇女耕田队等集体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劳动和公共事业。在中共的有效动员和系统化组织中,青年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反帝拥苏同盟等地方基层组织不断成熟,为妇女的思想和体力竞赛创造了活跃的社会氛围。妇女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竞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积极参加支前运动、红军欢送运动、纪念节的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放足运动、卫生运动等;妇女内部之间也开展洗衣队、作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等竞赛活动。妇女群体不仅在劳动中闪耀着模范的光芒,在自我价值的提升层面也凸显了强烈意愿,如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竞赛、模范学习运动、冬学运动、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等,踊跃加入补习学校,发动群众的读书会、识字班、读报团、推广卫生反对迷信等组织,成为竞赛活动的中坚力量。妇女群体积极生产、共同参与社会化自救,不仅克服了灾荒,改善了经济状况,提高了生产力,保障了前线供给,满足了军民的粮食需求,也丰富了根据地生活,提升了自我修养,推进了社会文明化程度。中共积极落实激励政策和保障措施,逐步强化了中

共的政治整合和政党认同:促进了党政军民关系的和谐融洽、发扬了民主意识、凝聚了民心、吸收和发展了妇女党员、强化了组织纪律、巩固了妇女的基层组织、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产运动等经济策略为妇女建构政治话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 妇女竞赛活动的运行机理

妇女竞赛活动的运行机理,体现在中共以现象学意义的唯物主义劳动观为指导,借助劳动的属性和劳动者践行的尺度,对劳动价值进行评估;以身体承接精神,以精神超越肉身,突破身体与精神的界限,实现粗笨、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向坚定、团结、高尚的个人品格过渡,反映了劳动与政治的关联性。中共以“劳模”为导向、以“劳模运动”为践行方式,鼓励、动员妇女发挥体能和体力的潜质,超越衡量标准,造就优秀的、高素质的社会典范。

中共对妇女竞赛活动的动员方式主要有以下渠道:首先,官方媒介报道和非官方的宣传。通过中共中央以及地方报刊,刊发领导人关于生产、学习、生活运动的讲话、文章、动员指示等。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的报道尤为频繁,通过报纸表彰县区妇女积极站岗、参加妇救会工作、上识字班等模范行为。如延安时期的《战声报》和各团的生产快报,定期报道生产情况,公布各单位的开荒成绩,以激励妇女的生产斗志。鉴于多数劳动妇女识字水平有限,遂以文字、图片、漫画等对竞赛活动进行宣传、记述、歌颂,还以非官方的歌曲、小调曲、戏剧、口号、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等宣传竞赛活动。其次,领导的示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延安时期“南泥湾政策”的实行,各级领导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在发展植棉、纺纱、畜牧、养蚕等事业中,周恩来和任弼时参加纺线比赛,并双双获得“纺线能手”的称号;毛泽东、朱德带头开荒种菜;陈云、张闻天带头参与生产等,领导干部的垂范效应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性整合和妇女力量的凝聚。再次,劳模的示范带头作用。在边区根据地开展不同层级的劳模运动、召开英雄座谈会,领导对劳模和英雄的召见与表彰、组织劳模宣讲、开展生产大竞赛运动的倡议等,如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举行的边区第二届群英会,表彰了模范妇女干部(如张品)、拥军模范(如戎冠秀、段喜娥)、模范劳动者(如模范女看护吕俊杰)、模范妇女会(如正定妇女会)等,掀起了宣传学习英雄模范的高潮,很多成绩突出的优秀妇女英模发展为妇女工作的领导者。最后,节日纪念活动中

宣传。在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七一建党节等盛大节日纪念中,妇女以生产、学习、生活竞赛的实际行动表达纪念之情,彰显了妇女群体的劳动能力和社会地位。中共也不断探索和完善对劳模的奖励机制,并依照妇女的实际需求,主要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为主。在精神上,给予劳模政治荣誉、广泛宣传其先进事迹、提升其社会地位等;物质上的奖励主要是给予劳模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包括农具、耕牛、日用品、纪念品、奖金等,还包括奖章、奖旗、奖状、牌匾、领导人题字等奖品。中共竞赛动员机制的完善与成熟,极大地刺激了妇女“人力资源”效能的发挥。在妇女竞赛活动中,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个人劳模,也创造了很多模范村,推广了社会福利事业,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和生活条件。有的妇女劳模被安排到基层机关工作,表现出较强的工作领导能力,妇女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充分发挥了党政机关领导与民众的桥梁作用;个人品质和政治素养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发展为党培养和选拔生产建设干部的后备力量。如阜平三区光城村民政委员刘玉珍当选妇女参政模范得奖金500元,全部借给三户生活最困难的老百姓做小买卖,帮助他们改善了生活。^[11]

中共以英雄模范为介质,英雄模范不仅要率先推动生产与战斗,更是实现中共与群众、国家与基层互动的桥梁,要带动促进基层群众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过程中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12]根据地的劳模运动强化了群众对党的信任与认同,如曲阳群英会上,崔翠娥说“我有七个儿子,都交给共产党领导吧!”^[13]有效连接了中共与群众、国家与基层,形成了条理化的自上而下的联动效应,也提升了妇女的政治影响力。劳模运动不仅推动了妇女群体的生产事业,而且也带动了思想的革命。妇女树立了“劳动光荣”的劳动观,并认识到“劳动者的穷苦,并不是天注定,而是阶级的不平等”,“有剥削的存在,才造成终生劳碌终生受苦的现象”^[14]。在延安大学就读俄语的青年学生沈霞,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选举劳动英雄、聆听劳模报告的经历,通过播种洋芋等生产劳动,写下“神圣的劳动”“要以体力劳动为我锻炼的目标”^[15]等感悟。妇女群众新劳动观的转变,彰显了各阶层对革命的认同,实现了凝聚人心、提振精神的效果。

三、女性话语在革命中对现代化的启动

政治革命与现代化互为镜像,构筑了独特的历史形象。妇女在让渡性别身份的同时,并未放弃对

其权利的争取,在保证群体利益的前提下,渐次获得参与政治的资格。

(一) 革命与现代性同构中的女性话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女性自由,体现了“个人主义”的情怀。卢梭的著名命题“人是被迫自由的”意味着人必须成为政治的人,才能获得正当性的自由。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化启蒙效应,使得妇女在开展“放足”“启智”运动中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提升了妇女个人权利的意识,为新民主主义妇女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劳动竞赛的实践中,妇女表现出了强劳动力的形象,逐步从体能竞赛过渡到向知识水平与政治素养的转变,妇女群体明确了性别平等的正义认知并演化为政治中的自我觉醒和价值认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从既定的群体意识来辨识,妇女被赋予了可靠的革命力量。革命启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现代化逻辑中,划分人群的标准包含国族、性别以及阶级。在现代国家理论的层面,女性对国家理念的回应,契合了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也对传统性逻辑进行了批判。习俗与政治的高度融合,建构了不同样态、功能、秩序、权力和价值的女性话语系统。在国家主权范畴之下所实施的话语行动就是革命,而革命的目标则是“解放”,解放的对象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但解放的前提是压迫,如何叙述或者建构被压迫者,妇女则成为最为直观也是最具肉身感的压迫话语实施场所。^[16]从深闺到社会的转型,“女性主义”审慎地处理了阶级权利与性别权利,由“新女性”实现了到“革命者”的自然过渡。转化后的角色,妇女还需克服阶级的障碍,在革命过程中女性与阶级的对立也成为不可约化的阻力。

(二) 妇女解放在现代性逻辑中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时期,女性话语的形成建立在妇女运动的语境下,被纳入阶级和民族解放之中。中国妇女解放,从来就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历史从相反的方面证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妇女解放,比如日本。它也不是妇女主体意识充分觉醒的结果——历史也证明,妇女意识的充分觉醒和妇女运动的强大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改变社会结构,比如美国。^{[5]75}在社会主义视域中,中共领导妇女运动走向了崭新阶段。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文件表达了妇女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

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7]中共六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妇女得到完全解放。革命与解放的双重交织中,妇女运动凝练了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话语,在多维互动中形成了紧密的糅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延续了革命时期妇女动员模式,在开展各项社会建设和政治运动的实践中,基层组织力量日益巩固和壮大。各级妇联为贯彻“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使过去不事生产的妇女转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一党的政策,要求妇女“提高觉悟,克服依赖男人、不愿劳动”的“落后思想”。^[18]妇女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领域,城乡妇女广泛参加生产劳动,拓展了妇女的工作领域;农村妇女也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而裹挟于集体农业劳动中。在新型劳动观的指引下,凸显了妇女的“革命性”作风,充分发挥个体主动性和群体协作性。在革命型政治语义模式下,形塑了文明化的妇女形象,建构着与其政治地位同步改善的机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婚姻法》,沿袭了苏区和延安时期的男女平等原则,在《选举法》中赋予了女性公民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威权明确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家庭生活中享有的平等权利,铸造了女性话语的强大生命力,涵养了妇女的革命理想、忠诚意识和牺牲精神,彰显了妇女群众的信仰使命与社会价值。

毛泽东曾论述“社会性”是人的基本特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19]女性在发挥人的“社会性”时,也被性别属性所钳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妇女形象的叙事中,流露了“妇女应该做家庭好管家”的传统情感。由于战争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中西文化的冲撞以及男性的心理诉求等因素,妇女囿于家中是对生活稳定的一种定式的理想渴望,塑造了传统的妇女地位。在现代化发展脉络中,女性话语的建构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女性的政治属性被性别属性所覆盖,对女性政治属性的认同,其性别属性也能得到认可和尊重,两者某种程度的同构关系构成了现代性的逻辑。随着文明的开化以及妇女群体的政治觉醒,为女性话语增添了现代化的内容和色彩,映射了政治语境下妇女形象的显性化。

【参考文献】

-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83.
- [2] 苏俐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文本解读与现实启示[J].理论建设,2020,(1):88-93.
- [3] [德]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34.
- [4] 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M].香港:同志出版社,2001:339.
- [5]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91.
- [7] 韩燕,范建英.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J].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1):21-26.
- [8] 戴隆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G].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682.
-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169.
- [10]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80.
- [11] 妇女参政模范刘玉珍拿奖金帮助贫困户[N].晋察冀日报,1944-06-07(2).
- [12] 岳谦厚,张宏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英模运动——以《晋察冀日报》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学刊,2019,(3):85-92.
- [13] 曲阳群英会上英雄们畅谈翻身感想[N].晋察冀日报,1944-12-10(2).
- [14] 陕甘宁边区财经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85.
- [15] 沈霞.延安四年(1942—1945)[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35.
- [16] 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9.
- [17]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
- [18]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342.
- [19]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1.

[责任编辑 朱小琴]

Female Discourse under the Political Empowermen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Hu Jing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Female discourse is a parallel logic in the isomorphism of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cy, female discourse expanded its space in the revolutionary field and uncovered the political rights covered by gender attribute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ompetition activities. The game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 makes female discours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ex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Female discourse writes historical narration in the rhythm of the times and injects fresh vitality in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olitical Empowerment; Competition Activities; Female Discourse; Modernization